

郭在貽先生學述

張湧泉 梁曉虹



郭在貽先生(1939—1989)，山東省鄒平縣人。他出身農家，自幼喪父，家境貧寒。少時訥言敏行，沈靜好學。1957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1961年留校當姜亮夫的助手，後轉中文系任教。歷任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杭州大學古籍所兼職教授、漢語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先生畢生致力於漢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教書育人，潛心著述，著有《訓詁叢稿》、《訓詁學》、《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集》、《敦煌變文集校議》(與張湧泉、黃征合作)等，在楚辭學、訓詁學、敦煌學諸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楚辭學

1961年，郭先生在姜亮夫的指導下，研讀語言文字學，又旁及歷史、哲學、文學等。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則為其專攻對象。後來他回憶說：「清人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我從頭到尾讀過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筆點讀一遍，然後又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浮簽，用一句套話來說，可謂『丹黃爛然』了。」（《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他後來發表的《說文段注與漢語詞彙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論文，站在現代語言學的高度，從正反兩個方面對段《注》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十年文革期間，郭先生由博覽羣書轉而為專門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辭》。自東漢王逸《楚辭注》以來，前人對《楚辭》已進行了反覆深入的研究，著述不下數百千種。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發明，談何容易！但郭先生沒有在困難面前卻步。在研讀了數以百計的《楚辭》論著的基礎上，他憑扎實的古漢語和古文獻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寫成了《楚辭解詁》一文，對《楚辭》中的一些聚訟紛紜、向無定論的疑難詞語進行了類似破譯密碼的考釋工作。其中如考證「九約」即「糾鑰」、「志度」即「跲蹢」、「雷淵」即「回淵」等，莫不洞見幽微，得其本真。他還寫了《近六十年來的楚辭研究》、《楚辭要籍述評》等論文，對《楚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宏觀的評述。文章論述全面，評驚得當，反映出研究者的真知灼見。

訓詁學

文革之後，郭先生的學術研究步入了新的階段。在蔣禮鴻的影響、熏陶下，他開始進行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從漢代經師到清代鴻儒，傳統的訓詁學在先秦兩漢典籍的訓釋方面無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對漢魏六朝以來的方俗語詞，卻不曾很好地研究過。這是漢語詞匯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也是訓詁學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的新領域。從1979年在《中國語文》發表《古漢語詞義札記》（二）一文開始，郭先生繼踵張相與蔣禮鴻諸前輩之後，對漢魏六朝以來文獻中的大量「字面生澀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方俗語詞進行了考釋，先後發表的有關論文多達四十餘篇。這些論文，思致綿密，徵引詳瞻，其結論多可信從。在俗語辭的研究中，他既汲取了前輩學者經常使用的歸納類比的訓釋方法，又善於把俗語詞研究和文字校勘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破除字形的迷障，使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正確的解釋。他還善於將俗語詞考釋和漢語詞匯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追本溯源，求其會通。他非常注意觀察那些較為特殊的語言現象，努力探尋並揭示那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寫成《唐詩中的反訓詞》、《杜詩異文釋例》、《唐文異文釋例》諸文。為了促進俗語詞的研究工作，郭先生還從理論上對俗語詞研究的特點與經驗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先後寫了《俗語詞研究與古籍整

理》、《俗語詞研究概述》等論文。在《訓詁學》一書中，更把漢魏六朝以來的方俗語詞研究闢為專章，就俗語詞研究的意義、歷史和現狀、材料、方法等進行了全面的闡述。日本學者佐藤晴彥認為這是非常獨特的，「直截了當地提出俗語詞問題並闢為一章，通過豐富的例證來強調說明俗語詞的研究成果對於正確地理解文句是多麼的重要，恐怕還是從本書開始的吧。在傳統的色彩極其濃厚的訓詁學的世界裏，祇有郭著這樣說並且付諸實踐，這是很不簡單的啊！」（《日本中國學會報》39集）

訓詁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舊的訓詁學作為經學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為經學服務的。過去的一些訓詁學著作也往往言必稱九經三傳，脫不開為經學服務的框子。如何加強訓詁學的實用性，是擺在當代訓詁學家面前的一大任務。郭先生在他訓詁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十分注重訓詁的實用性，他寫了《訓詁學與語文教學》、《訓詁學與辭書編纂》、《漫談古書的注釋》等一系列論文，努力使艱深的訓詁學同古籍整理、辭書編纂以及大中學校的語文教學掛鉤。「實用性」是貫穿《訓詁學》全書的主線，書中所揭示的訓詁學的作用，極具說服力；所概括的訓詁方法，又切實可行。現在許多高等學校把郭著《訓詁學》作為教材，實非偶然。

敦煌學

八十年代初，郭先生把研究重點放到敦煌文獻的語言文字上。敦煌遺書的發現，改變了整個中國學術史的面貌，也為方俗語詞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敦煌遺書中的變文、曲子詞、白話詩、卷契等文書，保存大量的口語資料，對於考索宋、元白話的沿溯，對於近代漢語詞匯、語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考釋了一大批變文中的方俗語詞，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蔣先生的影響下，郭先生在俗語詞研究的同時，開始研究敦煌的俗文學作品，先後發表了《唐代白話詩釋詞》、《王梵志詩校釋拾補》、《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王梵志詩匯校》等系列論文。在敦煌文獻方俗語詞考釋的過程中，郭先生注意到：敦煌俗文學作品的作者或抄寫者，大多水平不高，寫本中字形訛誤很多。這些作品中豐富的方俗語詞往往是通過俗字別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由於受學術發展水平的限制，一些前輩學者在整理敦煌遺書時，還未來得及對俗字、俗語詞給予足夠的注意，難免發生疏漏。所以，敦煌的俗語詞研究要取得長足的進展，必須從俗字研究和文書校理入手。基於這一點，自1987年起，郭先生帶領他的學生張湧泉、黃征，開始了「敦煌學三書」（即《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年底，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大致定稿。該書依據敦煌寫本原卷，校正了《敦煌變文集》的大量校錄錯誤。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語詞的考釋，是該書的一個特點。正如他生前給友人的信所說：「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

憶左民安

姜翠萱

左民安出生在山東省萊陽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十幾歲時喪母，與父親相依為命。幼時熟讀《三字經》，以至於幾十年後，他仍然能夠全部背誦出來。1949年之後，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完成了小學教育，並考入萊陽縣唯一的萊陽中學讀書。由於家境困難，無錢留校住宿，每天步行二十多公里的山路，天天堅持上學。晚上回到家中，慣例幫助父親挑水、擔泥、填牲口欄，然後在小油燈下完成作業。或許正是長期步行的鍛練，他在中學時竟成了一名出色的短跑運動員，在中學生運動會上，常常獲得第一名。

左民安於1955年中學畢業，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59年大學畢業，被派往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任教，在語言文字學家陸宗達的指導下，進行古代漢語的教學和研究。陸先生知識淵博，講課生動，又樂於扶掖後學，對左民安的幫助和影響很大。左民安開始有系統地閱讀古籍，但當時經濟十分困難，買不起陸先生指定的必讀書籍，他就利用星期天和假日，跑遍北京的舊書店，整天呆在舊書店裏翻閱舊圖書。碰到合適的，就用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購買上，其愛惜的程度不言而喻。然而，當他得知江蘇省高郵縣要籌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紀念館而苦於無王氏父

郭在貽先生治學嚴謹，學風樸實。在學術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的原則。每立一義，必臚列大量本證、旁證，窮源竟委，不為空疏皮傅之說。在《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中，他把自己的治學經驗歸納為四點：（一）讀書要博，研究要精。

（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三）做學問要重創造，貴發明。（四）做學問要刊落聲華，甘於寂寞。這正是他獻身於學術，同時又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

郭先生為人謙虛謹慎，待人熱情坦誠。不慕榮利，一生清貧。「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項者唯當明月」（語出《南史》），他手書壓在書房枱板下，並常以分贈朋友、弟子的這一名句，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

1989年1月10日，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他走得那麼匆忙，以至連差一天就到的五十歲生日都沒有趕上；他留得又那麼長久，他的精神永遠激勵著後代學人。